

“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清《广阳杂记》中的“天下四聚”之说，将汉口这座商业巨镇推上了历史舞台。汉口从明初的芦苇滩，到清朝“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繁华，尽显时代风流。

在时代的宏大叙事里，城市常被贴上经济引擎、文化高地等标签。当我们深入城市的肌理，会发现真正让城市鲜活、充满魅力的，是那些温暖人心的烟火气。这烟火气，不仅是街头巷尾的繁华喧闹，更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织的温度体现，是城市跳动的脉搏中流淌的温暖血液。

遥想往昔，鱼市喧闹，商贩云集，汉口以其海纳百川的包容与繁荣，吸引着八方来客，成为无数人心中梦想的起点。人们在

这里为了生计拼搏，为了梦想奋斗，也品味着生活的酸甜苦辣。时光流转，如今的汉口，传统市井与时尚风貌交相辉映，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让汉口成为一方既充满活力又富有底蕴的天地。

从湖北作家祁怀清《下汉口》的往昔记忆中，我们看到了汉口曾经的繁华与奋斗；从广东作家蔡旭《武汉好人》的现实温情里，我们感受到了汉口如今的温暖与关怀。这里的“武汉好人”并非英雄楷模，而是一个个普普通通却豪爽热情、耿直坦荡的市井男女。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传递着爱与温暖，让每一个走进这座城市的人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归属感。

城市的烟火，是人性的温度。这份温度，是城市的灵魂所在，也是我们心中最珍贵的宝藏。（周璐）

## 弘扬三大精神 奋力建成支点

# 抗洪精神的时代意蕴与影像叙事

门杨宏斌



1998年8月7日，江西九江城防堤西段发生决口，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和市民，先后出动101万人次，通过5昼夜的奋战，成功封堵了长江段的决口。

周国强 摄

战场上再次得到了生动的延续。22年时光流转，武汉龙王庙大堤依旧矗立在长江与其最大支流汉江的汇流之处。迎面而来是两条巨流的滚滚波涛，大堤背后则是人口稠密的汉口核心区。1998年立下生死牌的6位抗洪英雄，再次登上龙王庙，与新一代守堤人携手并肩，共同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汛长城。摄影作品《江堤夜巡》中，“党员先锋岗”红色旗帜在雨夜中鲜明的色彩对比，隐喻着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引领作用，这一画面，再次印证了抗洪精神作为“国家治理精神坐标”的深远价值，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勇往直前，永不退缩。

抗洪精神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传统智慧与“抗争超越”现代意识的融合体。1998年抗洪抢险摄影作品中，《战士们加把劲呀》中十几位战士奋力呐喊的神情、全力以赴的姿态，与摄影家陈天湖的作品《构筑人墙》同频共振。战士们手拉手以躯体抵御洪水的构图，暗合《山海经》中“大禹治水”的集体英雄主义叙事，实现了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国家精神的对接。《灾区的妈妈，儿子的脊梁就是你的家》中背负着老妈妈的小战士那稚嫩而坚毅的面庞，和灾区妈妈焦虑、痛苦的神情令人怦然心动过目难忘。而2020年的摄影作品《洪水中的书桌》则展现了新时代文化叙事的转向：志愿者托举儿童书桌的细节，将“守护生命”的人文关怀置于洪水背景中，桌面上未合上的课本与漂浮杂物的形成对比，解构了传统灾难叙事中的宏大悲壮，转而以微观视角生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的内涵。这种由“集体英雄”到“个体生命”的叙事嬗变，标志着抗洪精神在文化层面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

抗洪精神的演进轨迹折射出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1998年抗洪抢险摄影作品中“人定胜天”的主题，反映了当时以人力为主的治理模式；而2020年影像中的无人机巡查、APP实时监控、水上救援机器人下水救人、“龙吸水”排水等科技场景的应用，则展现了“科技赋能防汛”的治理升级。在《科技防汛新图景》系列摄影作品中，党员干部使用智能设备监测水位的场景与传统巡堤剪影并置，形成了“传统经验——现代技术”的视觉对话，印证了“制度优势+科技力量”的治理效能。这种影像的对比，有力揭示了抗洪精神已从单纯的“救灾精神”升华为“全周期治理精神”，其内涵延伸至防灾减灾、生态治理等社会治理多元领域，让抗洪精神摆脱了“历史符号”的刻板印象，成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活的精神。

### 镜头下的抗洪史诗与精神叙事

摄影的本质是对历史现场的“物质性见证”。摄影作品以其独特的纪实性、直观性与感染力，成为记录抗洪壮举、诠释抗洪精神的重要载体，为精神谱系注入了

鲜活的视觉印记。1998年，摄影家贺延光抓拍朱镕基总理亲赴抗洪前线指挥抢险的经典瞬间。照片里，朱总理手持话筒向部队官兵动员，挥动的手臂、庄严的神态与远眺的目光，尽显其“将人民置于心间至高之位”及战胜灾难的坚定信念。围聚其旁的将士们手持抢险工具、严阵以待，传递出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武汉市民自发熬制绿豆汤、为子弟兵送汤送水喝的场景，则以日常化细节展现出“全民参与”抗洪的社会动员图景。这些细节构成了抗洪精神的“视觉基因”，成为扎根于具体场景中的精神符号，为研究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变迁提供了具象化的视觉档案。

影像的力量源于能够引发集体情感的共振共情。1998年的摄影作品《大堤上的婚礼》中，新人笑容与防汛紧张场景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情感叙事在社交媒体时代呈现新形态：2020年《江堤上的睡姿》系列照片中，战士相依沉睡、以地当被等细节，通过新媒体平台迅猛传播，引发“泪目致敬”的全民互动，让“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以更贴近千万网民的方式触及心灵，凝聚社会共识。

1998年抗洪抢险的摄影作品在国际媒体传播和国内外重要展览展出中，军民合力封堵决口的画面被赋予“东方集体主义”的阐释——战士们整齐的队列、统一的动作与西方个人英雄主义叙事形成鲜明对比，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制度优势的窗口，向世界展现了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与“万众一心”的民族凝聚力。将军有泪不轻弹，而董万瑞将军挥泪告别与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士的特写镜头，让世界看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东方风貌。这正是摄影作为“国际语言”的独特价值：它让抗洪精神超越了地域与文化的界限，成为人类面对灾难时不屈精神的共同注脚。2020年《防汛常态化》系列摄影作品在海外社交媒体的传播，则展现了抗洪精神的当代性：抗洪中智能设备巡查等高科技应用场景，打破了“中国救灾——人力堆砌”的刻板印象，建构起“科技+制度+人文”的现代治理形象。这种视觉叙事的转变，标志着抗洪精神从“民族精神符号”升华为“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抗洪精神的传承长河中，摄影作品宛如熠熠星辰，照亮着前行的道路，以独特的方式让这一伟大精神跨越时空，以永续。从荆江大堤的泥泞手推到2020年的科技防汛，变的是时代的面貌，不变的是抗洪精神的底色。在摄影的光影长卷中，抗洪精神得以永续，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勇往直前，永不退缩，成为照亮民族复兴征程的永恒火炬。

杨宏斌，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武汉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评协理事。

# 江花周刊

2025年6月27日 星期五

主编：周国强 责任编辑：陈昌新 封面设计：洪新华 美术设计：江洋

## 下汉口

祁怀清

第一次下汉口，是小时候跟着爷爷到汉正街去卖鱼。

我儿时的忘年交，经常到我们村算命抽签的盲人爷爷韩半仙，曾经非常神秘地告诉我，说我爷爷是一只修炼了数百年的水獭精。之所以被“天上的事情知晓一半、地上的全知”的半仙看成水獭精，是因为爷爷特别擅长捕鱼。其实爷爷捕鱼的工具非常原始简单，是由奶奶用细篾编织、两头设有能进难出的逆须、编眼如椒花的花篮。元代著名诗人马祖常有诗《淮南渔歌》，“船中捕来鱼，卖钱买鱼篮。”其所说的鱼篮，就是爷爷用于捕鱼的花篮。爷爷的花篮不仅原始简单，还非常大气豪放，直径都在1米以上，长度接近2米，编眼大到我的三根手指头可以同时伸进去。爷爷能够捕到鱼，是因为他的眼睛很厉害，哪一处水域有鱼，哪一片湖面没有鱼，他一望即知。小时候跟着他去收花篮，从来没有落空过。最难忘的一次，竟然在一只花篮里同时游进去了十多条鲫鱼、鲤鱼、鳊鱼和鲫鱼。因为不堪重负，在即将出水的一刹那，花篮被压变形了，半花篮活蹦乱跳的大鱼差一点全部逃脱。爷爷使用的渔船很特别，前舱和中舱底板都可以取下来，换上钢丝网，因而他捕到的鱼总是生活在活水中。他为汉口的一些餐馆提供鲜鱼，始终很受欢迎。正是因为擅长捕鱼。

第一次跟着爷爷下汉口，是我6岁时的一个夏天午夜，鸡叫头遍，我就被叫醒，吃完没有一点胃口的早饭，就迷迷糊糊地跟着爷爷出了门。

在家门口上船后，爷爷轻快地荡起了双桨。沿途经过新虾渠、西干渠、南干渠、涵闸河和汉江，100多里水路，全都是顺水行船，所以老人家习惯把下汉口、汉阳和武昌都统称为“下汉口”。那天下午，爷爷就把船停泊到了汉正街边的码头上。

一路上看到很多稀奇有趣的事，因为时隔久远，许多细节都忘记了，唯一记得的是，那次下汉口，爷爷给我买了《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四套小人书，作为我的启蒙读物。后来那些书不幸全部遗失，现在我又新买了一套，放在书房了，有小朋友来家里做客，就让他们翻着玩。

那一年爷爷已经70多岁了，那是他最后一次下汉口。爷爷是个老顽童，喜欢找人摔跤、掰手腕、靠膀子，比赛谁爬树爬得高、爬得快。他之所以敢于独闯江湖，经常一个人下汉口，缘于他从小就练出了一身好功夫。他最骄傲的一件事是，赤手空拳，把围攻他的四兄弟全部揍翻在地。

从汉口回来不久，他又童心偶炽，同一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靠起了膀子。所谓靠膀子，是两个人都赤裸着上身，举起右臂，相互击打，与公山羊用头相互撞击类似。爷爷击败了前面的两个小伙子，同第三位挑战者较量时，突然听到咔嚓一声，豆大的汗珠从爷爷头上滚落下来——他的右臂肘骨被硬生生撞断。正是从那时起，爷爷才最终接受“廉颇老矣”这一无法回避的事实。

爷爷是在86岁时去世的。按照他的遗嘱，家人把他安葬在能够看得见水的地方。与爷爷一起被埋葬的，还有他总是津津乐道的“鲤鱼能够变化成水老鼠”“水獭会祭鱼”“风雨走蛟”等 he 总说自己曾经亲眼看见过的聊斋一类的水乡泽国的故事。

回顾爷爷的一生，我觉得他与那个以捕鱼为业的武陵人一样幸运。爷爷喜欢的江河湖渠始终流淌着碧浪清波，很多很大的鱼在其中欢快地游动着。爷爷没有看到水獭在他熟悉的江湖中消失，没有听说白鳢灭绝，没有体会到水体遭受污染后治理修复的艰辛。

### 二

同爷爷上甘岭战役中我的岳父也是退役军人。

岳父在上甘岭战役中因脚指头被冻掉而落下残疾，以后行走一直不太方便。从朝鲜战场上撤回来以后，岳父被安置到民政部门工作。因为微薄的新水实在无法养活没有工作的岳母和陆续出生的2男3女，岳父便狠心回到老家，在集镇上开了一家剃头铺子。尽管赚到的活钱比过去拿的死工资略多一些，但是依然无法填饱燕巢内那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巴。困守愁城终究不是办法，细心的岳母看到集镇上有人从汉正街进货，在自家门前摆摊售卖，便依葫芦画瓢，把剃头铺子临街的砖墙全部拿掉，改造成可以摆放服装和衣料的柜台。尽管大字不识一箩筐，但是胆大心细的岳母硬是用惊人的毅力，摸清了做买卖的门道，凭着诚实守信和勤劳节俭，让那个一穷二白的家庭脱贫致富。

能够吃饱穿暖之后，岳父岳母没有小富即安，而是把目光投向更高更远的地方，让儿女接受当时当地最好的教育。投资教育获得的回报是极其丰厚的，大舅舅从湖北医学院毕业后，一直在武汉大学附属中南医院从事医疗和教学工作；我妻子毕业于湖北工程学院，后来又回到湖北大学读完本科，在省委党校拿到研究生文凭，现在是汉川市委党校副校长，高级讲师。

最让岳父岳母欣慰的是，在他们的孙子辈中，出现了4位留学博士，还有6人毕业于国内知名院校，现在分别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上海、杭州、苏州、海口等地发展。如果岳母当年没有勇敢地只身下汉口，众多儿孙漂洋过海开枝散叶出人头地的重大成就就不可能取得。

爷爷和岳母下汉口是为了追求物质财富，我成年后下汉口，更多的则是为了满足精神文化需求。

读高中后第一次春游，去的就是汉口，还顺便逛了汉阳动物园，游了东湖，到武汉大学看了樱花。

正是那次春游，我和好几个同学都立下了“考进武汉大学”的雄心壮志。然而终究是实力不济，那年高考我只考进了湖北工程学院。为了拿到武汉大学的毕业证书，我一边工作，一边参加武汉大学的自学考试。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过去在武昌民主路有一家自学考试书店，每年的春秋两季，我都会选择一个星期天，搭早班车去汉口，然后在汉口体育馆门前换乘701路公交车过长江，在黄鹤楼前下车，从长江大桥南侧下桥，到自学书店购买教辅资料。再于中午12时许搭乘轮渡返回汉口，去寻访向忠发当过搬运工的码头，到顾顺章走过魔术的汉口新市场游艺厅周边走一走，逛一逛江汉路、吉庆街，看看江汉关博物馆和汉口近代建筑群，算好时间，搭乘最晚的一班车回家。

尽管当时工资很低，工作比较辛苦，学习考试的压力也蛮大，但是做自己喜欢的事，从不觉得苦和累。我只用了三年时间，不仅所有科目都以超过85分的优异成绩通过考试，顺利拿到武汉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本科毕业文凭，还以非常典型的“穷游”方式，把汉口的大街小巷逛了个遍，深切感受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陪同学下汉口寻亲的经历也值得一提。到汉口春游过后的那年冬天，放寒假后，我最要好的同学杨君约我陪他下汉口。他母亲嘱咐他，今年无论如何都要把在汉正街做生意的父亲接回家过年。在杨同学出生之前，他父亲就一直在汉正街做生意。在很小的时候，母亲曾经带他到父亲做生意的地方玩过一次。后来十多年间，父亲一直没有回过家，他和母亲也没有再去看过父亲。现在身为长子的杨同学已经长大成人，可以独自下汉口了，母亲就给他布置了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母亲难违，杨同学只得硬着头皮，让我陪同他下汉口寻亲。那是在BP机和手机都还没有出现、通信极不方便 的20世纪80年代初，要在人海茫茫的汉正街寻找一个基本没有什么印象甚至是在刻意躲避的人，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我们在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汉正街头漫无边际地游荡了三天，然后灰溜溜地回家复命。又过了十多年，杨同学结婚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他的父亲。也是在那一天，我还见到了与他长得非常相像的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妹妹。

另一个同学下汉口的故事则多少有些传奇色彩。初中同学刘洋的父亲去世较早，刘母身材娇小，干不了农活。为了生计，只得让刘同学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帮她到汉正街做生意。孤儿寡母，免不了受人欺负。一天隔壁商铺的“白富美”又与刘母扛上了，开始不管“白富美”怎样辱骂，刘母都隐忍着。后来“白富美”开始骂刘同学“尖嘴猴腮、鼠目寸光”，这时刘母忍耐不住了，也没有跳上天落地地声嘶力竭对骂，而是很淡定地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地反击说：“你真凶，你说我儿‘尖嘴猴腮、鼠目寸光’，我量你偷再多的汉子，也都生不出半个猴儿鼠儿出来。”此话一出，围观的人一阵哄笑，“白富美”如同被武功高手点中要害一般，瞬间熄了火。刘同学继承了母亲的沉着冷静，在汉正街左右逢源，修炼成我们那届初中同学中的首富。

### 四

女儿3岁时，我们第一次带她下汉口，就近游览了黄鹤楼。那次经历，对于女儿和我的影响都很大。自那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看到仿古建筑，女儿总会指着那些建筑说：“黄鹤楼，黄鹤楼。”开始我并没有太在意，后来听多了，突然明白过来，原来在女儿的认知中，黄鹤楼并不特指那座举世瞩目的名楼，而是泛指所有仿古建筑。顺着女儿那种不被束缚的视角去观察和联想，我意识到，不能只是简单地把汉口看作一个地理名词，还要把它当作一个商业传奇，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在过去数百年间，汉口早就是许多人心中富庶和繁华的象征，是许多人终生追逐的梦想。这也是过去若干年来，全国不知道有多少地方以“小汉口”自诩的原因所在。

顺着这样的思路进一步梳理，地处武汉上游的老家人之所以习惯把去武昌、汉阳和汉口统称为“下汉口”，也就很好理解了。武昌之名虽然大气磅礴，毕竟是从下游的鄂州移植过来的；而在过去若干年间，汉阳一直是县州府衙所在地，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略显高冷；唯有汉口，那里的江湖味道，那里的市井气息，让人感觉无比亲切，正如“货到汉口活”“有钱是汉口、无钱是汉坑”等俗语俚语一样，让人很容易接受。因而数百年来，“下汉口”不仅仅是老人家的一种行为，更是一种习惯，还是对于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大胆尝试，而且一旦尝试成功，就会上瘾，会如同日常的呼吸那样的熟悉和自然。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长江汉水永远浩浩荡荡，川流不息。作为两水交汇孕育出的城市，汉口已经演绎经典传奇数百年。在新的时代，古老而又年轻的汉口一定能如奇人崇拜的图腾那样，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再下汉口，定会更加赏心悦目，气象万千。

祁怀清，湖北汉川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行吟江河》。在人民日报、长江日报、今古传奇、长江丛刊等媒体上发表过多篇作品。